

最新修订版

读史



有智慧

下

冷成金◎著

【历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大智慧】

人大教授解读中国两千年历史智慧

第一畅销100,000册，新版全面修订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读史有智慧

最新修订版

冷成金◎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三编】

道家智慧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因而也是一种趋吉避凶、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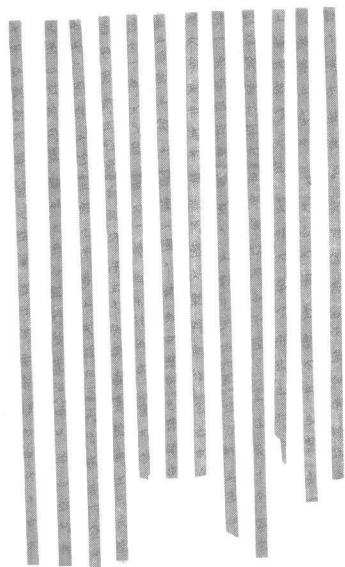


道家智慧概论

总的说来，道家智谋的聪明体现在其对人世間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穿，而在这种转化中，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之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说穿了，其以心智王天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天地万物皆由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实际上，黄老的道是十分抽象的，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黄老之道在施诸现实的过程中就没有了具体的价值标准。它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在不必遵循任何现有的或具体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去获得最大的世俗利益。在其深入的阐述中，黄老之道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现实的具体策略确实显得十分聪明，但其具体的社会效果就往往失去了正义感，其内核里除了对现实利益的关怀之外，没有任何的人文情怀，一片黑暗与冰冷。其实，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法家智谋就是在黄老道术的影响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即便法家本身也早就认识到在法家智谋中有着那么多的不合理、非正义的因素，但既然社会“需要这样治理”，圣人也就不必有“心”，只管“以天地之心为心”就是了。法家没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理论，他们从黄老之学那里为自己找到了依据，将自己神圣



楚简《老子》

化了。另外，黄老道术主张顺应自然，但在现实操作中是无法顺延自然的，只有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然后把天下交给“法律”，君王自己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其实也是诞生法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得道”。就是要对天地万物吉凶祸福的转化有一个清醒而又彻底的认识，即掌握道。但仅仅掌握了道还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精神修养与道相契合，即顺应道，实际上就是顺应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混沌的概念，指天地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规律，而二者又是浑融不分的）。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呢？黄老道术是有一套方法的，就是要做到四点：虚、静、一、守。《老子》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描述了人的精神修养的过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就是先实现“己虚”，由虚致“静”，由静而体会并遵循天地间的规律“一”，最后顺应这种规律，就是“守”。所谓虚，就是要破除个体的种种欲念，不要使自己的欲念充塞于心智，阻碍了体会道的通路。天下万物繁纷，但只要虚极静笃、神志清明，就能体会到万物流变自有根苗。所谓静，就是静观墨守，是与心浮气躁相对立的。如果不能沉潜，就不能静。虚为静的基础，而静又是观的基础，静观就是用自己感性的心智去体味。祸福轮转自有端倪，吉凶运作都明白清晰，此时，万物在个体的体味中归根返始。这样一来，个体的精神就达到了知命的境界。其实，同儒家一样，这也是一种修身，但不同的是，儒家的修身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正义的人格境界，而黄老的修身只是精华内敛，体察天地，使自己消失于天地与现实之中。所谓一，就是要心无旁骛，心志专一，依道行事。所谓守，就是在已经达到了上述的境界之后坚守本心，“守中”而御天下。如果能四者合一，就达到了黄老之学的最高境界——“玄德”之境。

三是在得道之后要御道而行。就是要把道具体实施到现实之中，这属于应用的范畴，是“道术”。《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意思是说要想统治人民，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服务，但这种服务实际上并不是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以下对上，而是故意作出姿态，在顺应百姓的要求中使百姓主动地归顺自己。其实，这就是《老子》最著名的取予之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无私，故能以天而私之；不争，故能得天下之大争。”老子也确实够坦荡的了。原来，所谓的“圣人”并不是不要，并不是无私，而是为了更大的私，彻底的私。对于人们的思想统治，黄老道术采取的是愚民政策。《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就有些卑鄙无耻了。在具体的方法上，往往采取的是以柔克刚、以智为愚、无为而治等策略。这些似乎都不用多说了，倒是其慈忍为怀的处世之道，颇值得注意。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对于收服人心来说，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明了许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志，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和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忍就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同样是忍，儒家之忍是为了更大的正义的行动，而道家之忍则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对其智谋类型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中国的治人之术更加深刻、更加隐秘、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它与法家智谋相表里，实在把传统的中国人牢牢地套住了。

当然，它并不是没有一丝可取之处。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它是有符合

人性和人道的地方的，有时候也多少表现出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黄老之术确实也会使社会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对于人民和社会的休养生息都起过不小的历史作用。对这些，我们是不应该否认的。

1. 萧规曹随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由历史故事而来的成语，叫做“萧规曹随”。现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陈陈相因、无所创建，并不算一个褒义词。但这个成语的来历，却有很丰富的文化含义。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入主丞相府。

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而对人事做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一时间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接印数日，相府依然如故，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曹参将自己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入见曹参，想要问个明白。

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

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遂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后吕雉专权，残酷地杀了戚姬，毒死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心感愤怒和绝望，遂躲入宫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闺房，消遣时光。及闻曹参所为，心想：“相国怎来学我，难道因我年幼，看不起我？”正在惠帝猜疑之时，中大夫曹窋入侍。曹窋乃曹参之子。于是惠帝便对曹窋说：“你回家后，可替朕问问你父：高祖新弃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国辅佐。现在，你的父亲为丞相，只知饮酒，无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曹窋辞别归家，把惠帝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

曹参听后，竟然勃然大怒，不问是非，取过戒尺，打了曹窋二百下，而且边打边说：“天下事你知多少？还不快快入宫侍驾！”曹窋挨打，既觉委屈，又不理解，入宫后，向惠帝直说了此事。惠帝听后，心中更感到疑惑，翌日朝后，便将曹参留下道：“你为何责打你的儿子曹窋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回去后，依然照旧行事。百姓经过大乱后，只求安宁，国无大事，徭役较轻，便算太平。所以曹参为政，竟得讴歌，歌云：“萧何为法，顛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八月，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参原本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汉初的社会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曹参的“萧规曹随”政策与当时的社会需要

十分吻合，与当时吕后专权、皇帝无能的朝廷状况也是十分吻合的。而这一切，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的明智。

(参见《汉书》等)

2. “柔道”开国与“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这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涵、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人们却常常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偶尔也会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狼狈万分，甚至差点儿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人说：“汉王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

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从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尽管朱家知道他是季布，但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之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见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奉事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当然，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刘邦的柔道实在是“小儿科”。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縯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



光武帝刘秀

刘秀好稼穡耕佃，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院中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谈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也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缤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在刘秀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缤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它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师，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缤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这些人正好借此进谗，说刘缤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刘秀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哥哥刘缤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儿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还经常流泪叹息。但当时他知道自己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校尉刘秀的僚属，都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强；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官民因此而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采纳。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这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害怕因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

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就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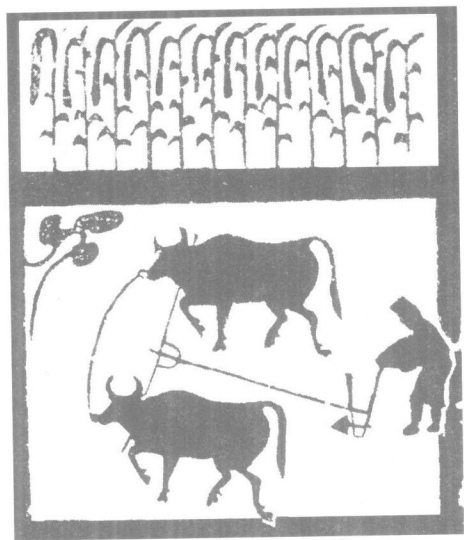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已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鲈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鲈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鲈投降。但朱鲈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忘小怨，朱鲈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

朱鲈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你们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事，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



东汉初年人民休养生息

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让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赐给每人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任何人。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

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恻”。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愍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参见《汉书》等）

3. 为臣之道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为臣之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权大压主，不要引起君主的怀疑和恐惧，否则就自身难保了。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总算能够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先生为什么立在中问呢？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吗？”

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当时，亭长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常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

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至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非常善于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充足而及时。但刘邦深恐如此下去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慰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十分警惕，为了免除嫌疑，他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凡能参军者全部送到刘邦的军中，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



萧何

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出二心。从此，君臣之间再无嫌隙。史书上这样记载这段历史，楚、汉战争之始，汉王刘邦令丞相萧何留守关中，辅佐太子刘盈，治理郡县、征集军饷，己则自统大军东讨项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

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备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说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了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状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地说道：“丞相为国